

第 7 章 占领

事情发生在 1972 年 9 月 5 日凌晨 4 点多，慕尼黑奥林匹克村内运动员正在酣睡。而村外，一群黑影正在悄无声息地靠近奥运村的外护栏。他们手拎运动包，蹑手蹑脚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慢慢靠近 25A 座楼门前的护栏。这里的护栏虽然夜晚锁闭，但却没有看守。小组的领导人，35 岁的卢特夫·阿费夫，又名依沙，早已对地形做了谨慎的调查，发现那些夜里违反奥运村规定私自外出喝酒的运动员常常是从这里翻进翻出的。由于保安系统松懈，运动员们进出自由，根本遇不到任何阻碍，因此这里是最佳突破口。依沙和他的七个同伴身着长袖运动衫，就算是保安看到他们也会误以为是运动员。

杰姆·阿尔盖谢，年近 18 岁，是小组中最年轻的队员，随着他们离护栏越来越近，他显得略微有点紧张，这时他们遇到一对刚刚饮酒归来的运动员，看起来他们也是要从 25A 座外的护栏翻进去。“运动员如果被发现夜里私自外出，他们就完了，一定会被从奥运村轰出去的。瞧瞧这几个醉鬼，显然他们是美国人，他们也想跨过护栏呢。”阿尔盖谢嘀咕着，这却给了依沙一个极好的主意，他们也可以假装成外国运动员，然后和那些美国人混在一起，这样还可以互相帮助，翻起护栏来倒是会更加简单呢。

“嗨，伙计，让我们这些落难人互相帮助一下吧。”阿尔盖谢边说边举起了一个美国运动员，帮他踩到了护栏上，而后美国运

动员自然而然地也把阿尔盖谢拉了上去，一起跳过了护栏。奥运广场上，几个公务员正在匆匆走过，赶着去上他们的早班。见到依沙他们也并未感到惊奇，而正如依沙所料，只是把他们当作普通的运动员。

阿尔盖谢事后回忆，“我们和美国人一起走了一段儿后才分手”。依沙小组穿过沉睡中的奥运村，走在科隆利大街上。这是一条贯穿奥运村东西的大街，两侧有着低矮灌木，还有漂亮的喷水池。没走多久，就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一幢土褐色的三层小楼前。

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武装行动。到了这时，就算是被那些手无寸铁的奥运村保安或是慕尼黑的警察发现，也是为时已晚了。依沙他们属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一个极端派系——“黑九月”组织，他们也称自己为信仰战士（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战斗，不惜牺牲生命）。八人都是全副武装，外衣里，运动包内藏着卡拉尼克夫冲锋枪、手榴弹等，为占领科隆利街 31 号楼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31 号楼，这座土色小楼，正是这次奥运会以色列人居住地的中心。依沙他们这次就是要让他们的行动永远载入奥运史册。

依沙小组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整个行动他们已经计划了好几个礼拜了，依沙和托尼（真名约瑟夫·纳扎尔）乔装在奥运村内潜伏了很久，早已摸清了奥运村的一切设施装备。依沙已经在德国生活 5 年了，他在柏林完成学业后，在奥运村工作。托尼平时在慕尼黑一家石油公司内工作。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奥运村。

当全世界都沉浸在奥运会这一运动盛会中时，依沙和托尼坐在科隆利大街的长椅上，一边下棋，一边注视着那些进出 31 号楼的运动员。托尼是个极其优秀的间谍。行动前一天早上 8 点，托尼曾在科隆利大街上碰到和那些以色列人同住在 31 号楼的一个乌拉圭队的随队裁判——路易斯·佛瑞得曼。托尼佯装

腼腆地与佛瑞得曼用英语攀谈，使后者以为托尼不过是个能得到好心邻居水果的普通工人，甚至让托尼从自己水果车上拿水果，让他能拿多少拿多少。

9月5号夜里，依沙和托尼带领着他们的小分队迅速穿过奥运村。在以色列人居住的楼外拐角，他们停了下来，脱下运动服，换上了便于攻击的作战服，面朝着康尼莱（以1896年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美国运动员詹姆斯·康尼莱命名）。31号楼共有24套公寓：前两层共11套，人口在主通道上，楼后有花园，而剩下的房间在第三层，该层还有两套屋顶公寓。以色列的21名队员被安排在1—6号，7—10号是乌拉圭的队员和教练们。3层的5套公寓和屋顶套房则住的是香港队员，剩下的居民是门房一家：门房，妻子，两个孩子；再有就是该楼的服务员。

凌晨4:30，这群恐怖分子在楼外集合完毕，他们打开1号公寓的主门，蹑手蹑脚地进到公共走廊。在这里要说明一下，除了1号公寓比较特殊，其他的10间公寓的门都是冲着大街的，而1号公寓有走廊、电梯以及通往三楼和屋顶的楼梯，而且还可以到达其他街道和停车场。但这么重要的一个主门却从未上过锁。

阿尔盖谢事后交待：“当我们进入大楼后，头儿分配给我们任务。我负责看守大楼的入口，其他队员上了楼开始执行计划。”当杰姆守在入口时，其他恐怖分子拿着事先配好的钥匙来到1号公寓门前。1号公寓内住着7名以色列人：运动员教练阿密苏·沙皮瑞、射击教练克哈特·绍尔、击剑教练安德尔·斯皮兹、举重教练土维尔·索克拉维克、举重裁判捷克沃·斯云杰、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摔跤裁判约瑟夫·顾得佛瑞曼，除顾得佛瑞曼外，其余的人都在熟睡。他是被门外细细的响声给吵醒了的。于是他下了床，赤脚走到门边，想听听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出乎意料，他看到门开了一条小缝。顾得佛瑞曼刚想看看外面的情况，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尽管他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清醒，但

是门外几双亮晶晶的眼睛和闪着冷光的冲锋枪已经指着他了。
“举起手来！”随着喊声，身高 1 米 95，133 公斤的大块头顾得佛瑞曼还想把门关上，怎奈门外的信仰战士已经合力往里冲了。

“哗啦”一声，门被撞开了。和顾得佛瑞曼同屋的索克拉维克从床上惊起，跑到客厅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变了形的门和夹在了门与墙中间的顾得佛瑞曼。“从半开着的门，我看到一张涂满黑色颜料的脸，手上还端着枪。那一瞬间，我知道，我所能做的只是逃，逃出这个地狱。”索克拉维克一边大声喊着，给其他的同伴报警，一边迅速退出卧室，向窗户冲去。“我想打开窗户，但是打不开，我只好使出全身的力量把它撞开。”

屋内，5 个恐怖分子还在用力推着，试图把顾得佛瑞曼弄走，好完全打开门。他们用手推着，用腿撑着，并把两只卡拉尼克夫冲锋枪伸到门内，试图把顾得佛瑞曼吓退。但是我们的英雄顾得佛瑞曼却拼命堵着门，和恐怖分子僵持了有十几秒钟，为屋内的索克拉维克提供了宝贵的逃跑时间。门终于完全打开了，恐怖分子冲了进来，用枪指着顾得佛瑞曼，让他趴到地上。

极度恐慌中，索克拉维克终于撞开了窗户，“窗户掉了下去，我一跃而出，逃出了公寓。”信仰战士跑到了窗户旁。“那些阿拉伯恐怖分子向我射击，我能听到子弹从耳旁呼呼而过。”索克拉维克没有往后看，他穿着睡衣，赤脚穿过小花园，转过街角，跑到了科隆利大街上射击不到的地方，藏在了一个刚刚建好的水泥花坛后，他在那里呆了差不多十分钟，才敢出来。然后索克拉维克接着跑，“我就是跑啊跑，直到撞上了奥运村内巡逻的警察，我支持不住了，大声地哭着，那一刹那我想我要死了。”

而此时，1 号公寓内，恐怖分子把顾得佛瑞曼从地上拽了起来，并开始去抓其他的以色列运动员。克哈特·绍尔是罗马尼亚人，曾在二战中参加过抵御纳粹的战斗。他和沙皮瑞一起，是在床上被绑住的。但有个以色列人醒了，并立即行动起来。这就是莫什·温伯格，因此当依沙冲进另一间卧室时，他正好碰到温伯

格，后者从床头柜上抄起一把水果刀，向这个恐怖分子头上戳去。刀子划开了依沙夹克的左衣兜，却没有伤到他的身体。依沙滚到一旁，他身后的另一名恐怖分子随即瞄准温伯格的脑袋，扳机一响，一颗子弹直直地从温伯格的一侧腮帮子穿入，又打穿了另一侧，留下了一个大洞。随着子弹，温伯格踉跄倒地，血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据阿尔盖谢事后的描述：“温伯格攻击依沙，并抓住了他。就在那时，小组中的另一个成员，冲进了房间，向着那个拿着武器并挟持了依沙的运动员开了枪。”

攻击行动此刻拉开了血腥的帷幕，犹太人的热血，再一次洒在了德国的土地上。

恐怖分子把温伯格从地上拽起，捆住，押到了客厅。他和另外四个以色列人一起被押上了楼梯。恐怖分子想把他们集中到安得尔·斯皮兹和捷克沃·斯云杰的卧室。

尽管温伯格已经受了重伤，但他还始终保持着清醒。当依沙和其他两名恐怖分子看守着其他俘虏的同时，托尼和余下的恐怖分子押着受伤的温伯格出了1号公寓，向下一个公寓走去——他们想抓到更多的人质。

不可思议的是，恐怖分子竟然忽略了2号公寓。而恰恰这套公寓里，以色列击剑选手丹·阿兰和莫沙·耶胡德·温斯坦，射击选手亨利·贺兹威和则里格·施托科，竞走选手沙乌尔·拉德尼还在熟睡。楼外，恐怖分子押着温伯格已经走过，来到了3号公寓门前。

整个奥运村还是一片沉寂，3号公寓中的人们还在梦香中。他们是：美国人戴维·伯格，来自克利夫兰郡，就读于哥伦比亚法律学院；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举重选手则维·佛瑞德曼 举重选手约瑟·罗曼；摔跤选手依利尔·哈芬·哥德·提巴瑞、马克·斯莱文——最有天赋的以色列摔跤选手。巴基斯坦恐怖分

子拉开枪栓,打开了 3 号公寓,潜行了进去。

提巴瑞,1.62 米,摔跤选手,已在奥运会自由式摔跤中取得了第 12 名。当那声打穿温伯格腮帮子的枪声(“像是什么东西爆开了。”他事后说。)把他吵醒时,他就像其他听到枪声的人一样,以为只是在做梦,翻了个身,接着又睡着了。几分钟后,当他听到他卧室外的声音时,他好奇地从床上爬起,没有惊扰他的室友——年轻的戴维·伯格——他提上了裤子,静静地打开房门,想看看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

提巴瑞刚好撞见一个穿黄汗衫的恐怖分子正拿着枪指着他的朋友马克·斯莱文和依利尔·哈芬,他们已经被制服了。“那时,我刚好和恐怖分子迎面对立,他命令斯莱文和依利尔·哈芬他们两个紧紧站到我的后边。其他的队员也听到了骚动的声音。几秒钟后,戴维·伯格也好奇地走了出来,遭到和提巴瑞同样的命运。“他和我犯了一样的错误,”提巴瑞说;“我自己走了出来,他也是,所以都被逮住了。”

恐怖分子大声呼喊,用枪戳着运动员们,这些可怜的以色列人被推下了楼梯,他们和举重选手约瑟·罗曼、则维·佛瑞德曼还有受了伤的温伯格被押到了一块。这些巴勒斯坦人已经找到了他们的目标。

温伯格用手帕清理了伤口,然后用衣服堵住伤口止血。当这些已被抓到的几乎赤身裸体的以色列运动员在枪口的威胁下老老实实被押着的同时,一个恐怖分子开始进行地毯式搜索,看是否有落网的运动员,壁柜,床下,一处也不放过。

托尼从二楼跃下楼梯,喝问着其他运动员的藏身之地。没有人回答,所有的以色列人沉默着。“袭击他们,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戴维·伯格用简短的希伯来语向同伴喊着。但那些巴勒斯坦人反应太快了。“有个恐怖分子明白了戴维在做什么,他用枪指着我的腰,命令我径直走向走廊,对着门口。”提巴瑞回忆说。

恐怖分子让他们排成一行，举起手来，甚至在比赛中由于韧带拉伤而拄拐杖的约瑟·罗曼也不例外，他们被押出公寓楼。来到科隆利大街上。

提巴瑞知道情况危急，巴勒斯坦人正把他们往 1 号公寓押送，那里已经被完全占领了，但他没有任何主意。据他所知，巴勒斯坦人最有可能做的就是杀死他们，戴维·伯格那一声“情况不会更糟”还在耳边荡漾，到底怎么办？提巴瑞决定为自由冒一次险。

当他们被带回 1 号公寓的入口时，他突然向一边跑去。“我没有朝那些被捉了的教练走去，而是跳下了楼梯。”提巴瑞说。

提巴瑞把一个还未明白怎么回事情的恐怖分子推到一边，从 1 号公寓跳下楼梯，向奥运村地下停车场方向跑去。那个方向居住着很多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恐怖分子“哒哒”地在他背后开着枪，但地下停车场的柱子救了他的命，他安全了。“我觉得两三支枪在我身后响着，几乎射中了我，我使出吃奶的劲，跑着曲线，以避免扫射。我都不敢相信，居然没有一发子弹射中了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每一分钟都是那么漫长，像一辈子似的。”

当这个摔跤选手从恐怖分子手中逃脱厄运的时候，躺在地上深受重伤的温伯格，趁机抓住身旁的恐怖分子——19 岁的穆罕默德·色菲德（又名巴登），一计重拳，把巴登的牙齿打落了几颗，也打折了他的下颌骨。

约瑟·罗曼和戴维·伯格由于被枪指着腰，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温伯格试图捡起巴登被他打落的枪，但另一名恐怖分子开火了，一串子弹射入了温伯格的胸膛，他的身上被射成了蜂窝，温伯格终于倒在了血泊中。

对于杀人，这些巴勒斯坦人有着自己的看法。尽管他们不否认杀人，但他们也是迫不得已。阿布·达欧迪“黑九月”组织成员之一，也是一个巴勒斯坦好战分子，此次行动的策划者扬言：

“任何人都未被授权向人质开枪。”但他同时说：“一个运动员，是个大块头，试图抢我小组成员的枪，所以不得不开枪射击他，要不就是我们死了。处于自卫开枪是合情合理的。”

阿尔盖谢也证实说：“没有命令要我们杀人，除非逼不得已。”但这些巴勒斯坦人也被告知，在遇到阻碍的时候可以开枪。他们也一定清楚地知道，这些优秀的运动员、教练们个个身手不凡，要想让他们乖乖就范，不用武力是不行的。

恐怖分子知道，枪杀温伯格的声音已经吵醒了周围的邻居，科隆利大街上的灯一盏盏地亮起，有的窗帘也拉开了。警察几分钟内就会到达。恐怖分子喊着，用枪推着余下的人质上楼，想把他们与顾得佛瑞曼他们汇集到一起。

约瑟·罗曼是个举重选手，在以色列他经常能一下练上几个小时的举重。他并不想老老实实就范，甚至在亲眼目睹了温伯格被枪杀，他体内反抗的欲望也没有被抑制住。当罗曼被推上楼，他扔掉他的拐杖，向一个恐怖分子扑去，试图抓住他的枪，把他的伙伴们从魔掌中救出来。当另一个恐怖分子的一梭子子弹射入约瑟的身体时，他已经抓住了一支枪，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这个有着三个女儿的父亲倒在了地板上，闭上了眼睛。第二个以色列人死了。

“射击是必然的，没有人能控制住局面。”阿尔盖谢辩白道，“他们几乎让整个行动破产，他们都是强壮的运动员，死的第二个人是个强有力的家伙，他袭击了我的队友，抓住了一支枪，几乎从我队友的手里抢了过去，因此我们不得不开枪。”

从3号公寓押出的余下4个幸存者，伯格·佛瑞德曼，哈芬·斯莱文被押入安德尔·斯皮兹的卧室，和其他被抓住的运动员汇集到了一起。约瑟·罗曼的尸体在地板上躺着，给那些犹太人以警告——谁再试图逃跑，将是同样的下场。在毗邻的二号

楼内的以色列人听到了枪声，惊慌地向后窗跑去，他们中间有沙乌尔·拉德尼医生，他是位于泰尔阿威的金融大学教授，著名的前 50 公里竞走运动员，8 岁时被从耳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释放。

沙乌尔医生说：“所有的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几乎不能理清头绪。我迅速环顾着四周，看着周围的情况，然后从后窗跳出。你从未见过别人向你射击，毫无预见性，没有任何警示，一切就发生了。但犹太人是机警过人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危险随时陪伴。”

沙乌尔跑进美国队的公寓，用力敲打着住在一层的教练们的房门。据美国马拉松选手，住在 5 层的肯尼·摩尔说，美国田径教练，比尔·伯威曼嘟嘟囔囔地打开了门。沙乌尔极度狂乱地站在门外。

“让我进去！”沙乌尔焦急地喊着。

“为什么？”伯威曼不高兴地问。

“那群阿拉伯人闯进了我们的房子。”

“赶走就是了。”

“他们有枪，你听到没有，他们有枪，已经打死两个人了。”

伯威曼清醒了，赶紧把沙乌尔推进屋内安全的地方，报了警。

恐怖分子本想也抓住 2 号公寓里的以色列人，但当他们目睹到沙乌尔逃跑以后，他们知道已经太迟了。“我们也想绑架 2 号公寓中的人，但显然他们听到了这边发生的一切，都跳窗逃跑了。”阿尔盖谢回忆说。

沙乌尔逃出来了，但还有几个以色列人还留在 2 号公寓里，他们从窗帘后窥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也曾被吵醒过，那只不过是几个射击运动员放爆竹烟火来进行庆祝。但显然这次的响声不一样，带着很重的杀气。

曾在开幕式上举着以色列国旗环场一周的该国射击选手亨

利·贺兹威也是被屋外的嘈杂吵醒的。“我听到 AK-47 型自动冲锋枪的声音（已经上了膛的），只有这种枪在装子弹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特殊的声音。因此我知道什么事不对劲了，于是我起床到窗边看看。”

贺兹威看到窗外一个年轻的奥运村保安正慢慢向以色列住宅区走来。一个德国保洁妇已经打电话报警说在凌晨 4:50 左右听到枪声，所以值班室派这个保安过来看看。他左右张望，并没有看到任何异常，但他发现了站在窗口的贺兹威，就向他询问情况。

可是贺兹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得无奈地向保安耸耸肩。德国保安又看了看，什么事也没有。可是他刚要转身，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公寓的前门突然打开了，出现在他面前的赫然是一个手持卡拉尼可夫冲锋枪的阿拉伯人。

保安倒是显得很镇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向这个武装恐怖分子低吼着，先是用德语，随后又用英语慢慢地说了一遍。但这个恐怖分子好像完全没有看到他一样，只是环顾了四周一圈，然后又转身回屋去了。只留下保安呆呆地站在那里，已经吓出了一身汗。

保安哆嗦着向值班室报告说发现一个持枪歹徒已经占领以色列住宅，从前门还可以看到另两个武装恐怖分子。这个恐怖事件至此，才真正地被注意到。不一会儿，又有两个未武装的保安跑来了。

曼菲德·施拉帕是奥运村中第一个被叫醒、得到消息的上校，这个有着刚毅面容的人是慕尼黑警察局局长。以前他从未失手过。施拉帕是法律系毕业，由于在地方警察局推广“勇气为本”，并连破重案，在 1963 年 11 月当上了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警察局局长。

施拉帕是在凌晨 5:00 被电话叫醒的，此时距恐怖分子第一

次与保安照面 10 分钟。他马上下令封锁以色列住宅区，与其他地方隔离，并迅速致电给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布鲁诺·默科，向他扼要地报告了当前形势。施拉帕匆忙套上衣裤，来不及向熟睡中的妻子女儿说明情况，就赶紧驾车赶往奥运村。他的警车在夜风中闪着警灯飞驰着。

与此同时，各处电话铃声大作，默科电话通知了德国内政部长汉斯·迪崔赫·耿什：“这个消息就像重磅炸弹一样，它意味着在德国境内犹太人又一次陷入危难之中。”他立刻致电给德国总理勃兰特和外交部长怀特·史依尔，叫醒自己的高级文职公务员保罗·佛朗克，并同驻波恩的以色列大使伊力施伟·本·侯因联系，截至凌晨 5:40，大使已同以色列国内高级领导进行了全面的联系。从波恩到以色列的官员无一不被该消息震惊。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是在她耶路撒冷的官邸里被她的军事部长唤醒的。她的手下已经查明了恐怖分子的身份。

凌晨 5:10 分，依照施拉帕的命令，一个慕尼黑警察走进科隆利大街的封锁圈，他双臂高举，以证明未携带武器，他仔细地观察以色列人驻扎的这座三层小楼，察看是否还有人质生存的迹象。一个恐怖分子从一楼的窗户扔出了两个纸团，这是“黑九月”提出的人质交换要求，这个警察赶紧捡起这些写着要求的纸条。

大约 15 分钟后，5:25 左右，更多的德国警方高官赶到现场，以掌握最新动态。德国人不敢相信，恐怖分子竟想破坏他们的奥运会！该次行动的小组长依沙身着轻便探险服，脸上、手上涂满黑色鞋油，他正在前门同官员们进行简短的交涉，其他的恐怖分子，有两名持枪站在楼上的窗前监视着这一切。

慕尼黑运动会是一次极有秩序的运动，官员们设想能说明这些恐怖分子自己离开，和平解决问题。但这些巴勒斯坦人都是亡命之徒，依沙的计划本来就是要向世界证明他们的决心。依沙向身后示意，几乎赤裸，满身血污的温伯格的尸体被抬了出

来，扔在了被惊得目瞪口呆的警察们面前。

温伯格的身上已经千疮百孔了。他脸的一边已经没了，胸部也被打得都翻了花。他的血已经快凝固，变成了暗红色。

“他赤裸着……满身血污。”此次奥运会以色列代表团团长史木尔·拉尔金说。拉尔金住在5号公寓，离1号公寓只有几米之遥。他被第一声枪声吵醒后，走到床边，并未发现什么，于是又再次倒头大睡，紧接着再次被连续枪声吵醒。“我又到窗旁看，然后我看到……温伯格被从窗户扔到了便道上。”他的尸体离拉尔金的窗户不足20米。

在2号公寓内，贺兹威也看到了这一幕，他和同伴们在前门堵上东西，然后继续从窗户观望。“我看到温伯格挂了彩，而且看样子，他已经不行了。”警察通过无线电请求增援。5:30分，救护车停在了路旁，两个救护冒着危险，无视荷枪实弹的恐怖分子，勇敢地跑到温伯格跟前。他们跪在他的身边，量了量他的脉搏。证明他已死。

“两个来自红十字的救护做着手势，我明白，那是说明‘已死亡’的手势。”贺兹威回忆道。我告诉我的同伴，我们要尽快离开公寓。我们到了公寓楼下另一侧。每幢公寓都有一个小花园。我们穿过花园，跑了出来。外面警察已经开始全面包围1号公寓，两个救护把温伯格的尸体抬走了。

拉尔金在目睹温伯格的尸体被抛出窗外后，立即跑到楼下自己的办公室里给奥运会和以色列的官方打电话报告情况。“我的电话簿里有他们所有人的电话，我也有媒体各界记者的电话。”拉尔金给不下4个记者和奥林匹克官员打了电话，简单地说明了一下事态。“我想他们可能知道些情况。”官员们立刻给以色列打电话，通知政府高级官员，而记者也开始听到些风声，试图来捕捉新闻。

施拉帕还在赶往奥运村的路上，奥运村村长、西德奥运组委会秘书长霍则·卢格也收到了消息。“5:30，警察来敲我的门，是

我妻子开的门,然后她大声喊我。他们(警察)说在奥运村内发生涉及以色列人的恐怖事件,恐怖分子要求我作为奥运村村长,也要参加谈判,他们说有我的情况下才接受同警方谈判。”

“我几乎都没有时间来思考,等于一开始我就被卷入了这次事件。”卢格穿上衣服,赶往现场。

施拉帕和卢格几乎同时到达,一起察看了恐怖分子扔出来的纸条。上面提的要求很清楚:恐怖分子要求释放 234 名被以色列当局关押的巴勒斯坦游击战士,同时释放被联邦德国政府拘禁的“红色旅”臭名昭著的领导人乌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恐怖分子等待的底线是 9:00,到时如果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将开始处死人质。

现在,德国警方倾巢而出。而施拉帕也正式向政府发出警示。5:30,军队到达,大批援助也随后而至:身着防弹衣,配备远距离瞄准自动冲锋枪的狙击手也已到位,他们趴在楼顶上,俯视着 31 号楼,等待着命令。

位于奥运村东部的组委会办公室里,施拉帕、卢格和其他高级官员们召开了紧急会议来决定下一步作战计划。施拉帕首先提议,需要与恐怖分子用专门频道进行对话。他的助手劳特巴赫夫人已经去了科隆利大街,与恐怖分子进行接触,但显然这还远远不够,应该找来对话方面的专家才行。来自于埃森的 42 岁女警察安妮丽丝·葛瑞丝,此次奥运会保安工作的志愿者,被提议作为谈话的中间人。这虽然是个非常大胆的提议,但她实在是合适人选,她温和稳重的性格无疑可以使恐怖分子放松一些。

8:10,安妮丽丝·葛瑞丝从组委会办公室出发,穿过封锁线,来到科隆利大街,在沿途留在屋内的运动员的好奇注目下,走到 31 号楼前。她在距 31 号楼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通知劳特巴赫夫人,由她来接替工作。

她们交谈时,依沙出现在楼门口。他犹豫了一下,不太明白

面前两个女人的局面——未武装的葛瑞丝，身着蓝色的奥运会安全制服，站在他面前。葛瑞丝见到依沙，立即提问：“请问，这次行动是什么性质？”

依沙操一口流利的德语（有点法国口音，葛瑞丝事后说）：“这次行动不是针对你们，或是德国的。”然后他开始说明他们的要求。

“对于你们提出的释放以色列关押的所有 234 名政治犯的要求，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是把你们的要求转告给以色列当局。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好好地谈一谈。”

依沙并不想接受任何讨价还价折中的建议：“释放所有的人，否则我们杀光人质。”

从 6:00—8:15 分，科隆利大街上一直保持着寂静，依沙和托尼偶尔走出前门看看情况，其他恐怖分子也从楼上窗户时不时向外观望，以防德国警方进行突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情是，封锁圈外的奥运村并不知道情况，一切如故。德国警方就只是把这一地区封锁起来，而奥运村里其他地方运动员还是照常起床，开始准备一天的赛事，根本不知道情况。早上 8:00，该天的第一个项目——马术开始了。

8:15 分，科隆利大街的情况，用沃尔福冈·吉特的话来描述最为贴切。吉特是东德的一名记者，他偷偷潜入 31 号楼对面的东德举重选手的房间进行观察，此处距离 31 号楼只有 15 米远，他甚至可以看到 5 名武装歹徒在对面的窗户冲他咧了咧嘴。吉特关于这次事件的记录，被德国秘密特工存档于斯达司。依沙站在楼口，穿着亚麻布衣裤，带着一顶白色帽子，脸上涂着黑色鞋油，时不时地抽上一支烟。在一楼窗户旁，坐着一个头戴灰色宽沿帽，大墨镜，红色衬衫的男人，他衬衫扣没有全扣，露出脖子上戴的金项链。这就是托尼，黑九月此次行动的第二号领导人，绰号“牛仔”。

“后来，一个卷发、穿红衬衫的年轻男子和另一个穿着相似，手持左轮手枪的人出现在冲着二楼阳台的门口。还有一个穿蓝色衬衫的恐怖分子站在楼梯与前门间。”当其他东德人开始拍照时“那个牛仔冲我们眨眨眼，摸了摸他的枪，但并未拔出来。‘我不喜欢这样’，那个恐怖分子说。但他还是向他的同伴们说明我们这几个东德人没什么可需要担心的”。据斯达司秘密档案中吉特的描述。

尽管在科隆利大街上没有什么动静，但在奥运村组委会楼——G-1楼里可是一分钟也没有安停过。7:00，联邦德国内务总理汉斯·迪崔赫·耿什飞抵慕尼黑，与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副官乌瑞喜·卫格尼，负责传令给德国边防。

成百上千的记者蜂拥而至，尽管他们知之甚少，但都意识到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恐怖分子真的袭击奥运会？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但这一惊人消息却通过电台、电视台已经传往世界各地。

7:15，德国高官在奥运组委会塔楼 G-1 碰头。与会者有施拉帕、卢格、耿什、汉斯·犹赫丝·弗萃（组委会副主席、前任慕尼黑市长）、韦力·导默（德国奥运委员会主席、德国业余体育运动负责人）和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布鲁诺·默科。

虽然在场的人中，汉斯·迪崔赫·耿什是官位最高的，但由于战后德国宪法的特殊性，规定了发生在巴伐利亚的事件应该由当地解决，因此耿什能做的也只是提提建议，帮助安排调度一下。

大家都同意解决问题应该从谈判入手，而不是使用武力，因此决定在 G-1 楼 3 层霍则·卢格的办公室成立紧急事件处理委员会，由布鲁诺·默科领导。施拉帕宣布他已经招来高科技通讯警车，并已停在科隆利大街旁，作为前沿指挥所。军士们急忙进行安排。

波恩传来最新消息，德国外交部已与以色列通话，进行交

涉，但前景不容乐观：以色列政府可能不打算妥协。G-1 楼中的人知道解救人质的关键就是争夺时间。9:00 的底限像座沉重的大山摆在众人面前。

在目睹温伯格尸体被抛出窗外后的一个半小时里，拉尔金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监视着恐怖分子的一举一动。约 6:30，他被德国警方护送来卢格办公室，在那里他致电给以色列政府。“我直接打给以色列政府，与总理交换了意见。”拉尔金说。

拉尔金已得知恐怖分子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现在的形势对他的同事们相当不利。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态她拒绝与恐怖分子谈判。“这是我们的政策，绝不向恐怖分子低头屈服！”

整个以色列代表团成员都沉浸在恐慌中。提巴瑞，当他被带到组委会办公室时，他还没有完全从恐惧中走出来。从恐怖分子手底下逃脱后，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奥运村护栏，此处距以色列住宅区足足有 70 米远，跳过护栏，他逃到了专门为记者准备的住宅区。最开始没有人注意到他。“大概有 20 多秒，没有人注意到我，他们只是嘲笑我几乎全裸，在旁边指指点点。”提巴瑞抓住一个新闻记者，“尽量平静”地向他说明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故事的始末。”

一个慕尼黑警察赶来保护他，并把他安全送到奥委会。“一个会德语和希伯来语的女士充当翻译，我边指地图边讲发生的事情，我是怎么逃出来的，谁受了伤，恐怖分子有多少人，什么特征。”提巴瑞回忆说。德国警察给他找来衣服，并把他和其他以色列代表团团员安排在一起，等待进一步消息。

袭击事件迅速在以色列运动员、官员中传播开来。住在奥运村女运动员区的以色列短跑运动员埃赛·罗瑟在睡梦中听到敲门声。“我以为是有人叫我起床去参加比赛。”罗瑟说。早些时候，

有两个美国运动员由于错用了过期赛事表，睡过了头。罗瑟怕是自己也错过了时间。“我赶紧穿衣服，并喊‘等一下’。我打开门，看到游泳选手施珞密特·尼尔站在门前，还有一个陌生人。他告诉我说恐怖分子袭击了以色列住宅，所有以色列人要集中在一起。我不知所措，吓呆了。”

罗瑟迅速收拾妥当，被带到奥委会。拉尔金和提巴瑞已经等在那里了。“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就像是每幢楼里都有恐怖分子，他们就潜伏在那里，随时等待着袭击我们。从一幢楼走到另一幢楼都是一次考验。”有些队员已经听说他们的朋友中死了一个或两个。“他们没有点出具体人名，但我总怕是我的教练，感觉真难受。”罗瑟说。所有以色列人都坐在一间大房间里，看电视、听广播，互相安慰，等待着最新消息。眼看 9:00 的底线就要到了。“当时的情势紧张，我们都不知道能做些什么。”